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8

民国卷

王余光
吴永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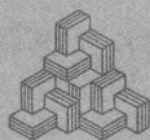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出版通史

总顾问

石宗源 柳斌杰



民

8

国

卷

王余光 吴永贵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 / 王余光, 吴永贵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68 - 1790 - 5

I. 中… II. ①王…②吴… III. ①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②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民国 IV.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3911 号

责任编辑 / 刘伟见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敬人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51259192(总编室) (010)51259186(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正文印张 / 37.25 彩页印张 0.25

字 数 / 538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7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

导 论	1
-----------	---

上 编

第一章 民国出版业的形成 (1912—1919)	9
第一节 晚清出版业的影响	9
第二节 民国出版业中心——上海	21
第三节 中华书局崛起于出版界	27
第四节 大东书局的创办与发展	35
第五节 商务印书馆在民国时期继续称雄	39
第二章 民国出版业的发展 (1919—1927)	46
第一节 五四新思潮下的出版变革	46
第二节 《新青年》与五四前后的报刊	50
第三节 世界书局的改组与发展	57
第四节 亚东图书馆与泰东图书局	62
第五节 新潮社与北新书局	70
第三章 民国出版业的兴盛 (1927—1937)	80
第一节 出版业的兴盛	80

第二节	各地区出版业的成长	87
第三节	《申报》与《大公报》	93
第四节	国民党报刊和正中书局	103
第五节	开明书店与文化生活出版社	107
第六节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上海杂志公司	116
第四章	民国出版业的艰难历程 (1937—1949)	127
第一节	战争的打击与出版业的艰难	127
第二节	战时出版业的后方大转移	130
第三节	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136
第四节	敌占区出版业的奴役与反奴役斗争	140
第五节	战后出版业的复员与重建	145

下 编

第五章	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	153
第一节	出版法律与法规	153
第二节	书刊审查制度	163
第三节	书刊查禁与出版压制	167
第四节	版权纠纷	170
第五节	书业行业组织	176
第六章	出版经营活动	182
第一节	机构组织与人员构成	182
第二节	资本构成与资金管理	192
第三节	选题与组稿	198
第四节	装帧与印刷	202
第五节	书刊发行	210
第六节	书业广告	216
第七节	书评活动	220

第八节 多种经营	227
第七章 出版家群体	232
第一节 张元济与王云五	232
第二节 陆费逵与舒新城	242
第三节 章锡琛、夏丏尊与叶圣陶	254
第四节 邹韬奋、徐伯昕与胡愈之	265
第五节 沈知方与张静庐	277
第六节 鲁迅与巴金	284
第七节 其他较有影响的编辑出版人	291
第八章 出版与社会文化	326
第一节 出版与文化社团	326
第二节 出版与国语运动	336
第三节 出版与图书馆	344
第四节 畅销书出版	350
第五节 丛书的出版	372
第六节 《万有文库》的出版	376
第九章 教科书出版	385
第一节 现代教育的发展	385
第二节 中小学教科书	388
第三节 大学教科书	401
第四节 社会教育与教科书	406
第五节 儿童读物	411
第十章 工具书、学术著作和古籍出版	423
第一节 工具书出版	423
第二节 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出版	430
第三节 自然科学图书出版	434

第四节	古籍的出版	438
第十一章	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	450
第一节	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文献出版	451
第二节	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字文献	461
第三节	藏文文献的编辑出版	469
第四节	彝文、傣文、纳西文书籍的整理出版	475
第五节	南方少数民族方块字和拼音文字记录的文献 ...	480
第六节	民国时期少数民族出版的特点	483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	48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与出版	486
第二节	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等党的早期出版机构 ...	492
第三节	苏区出版业	498
第四节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出版事业	502
第五节	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	507
第六节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的出版事业	516
附录一	民国出版大事记	523
附录二	参考文献	575
后 记		584

导 论

中华民国史始于1912年止于1949年，大约38个年头。本卷叙述的就是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出版业发展变化的历程。

民国出版史年代跨度虽然不长，但在出版史上却是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它承接晚清时期萌蘖而生的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出版，一路发展下来，并在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民营出版业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手段更加成熟，规模化经营的产业特征更加明显。这既与古代传统刻印时期手工作坊式的经营特点有较大差异，也与紧接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出版经济形态存在相当不同，表现出自身阶段的历史特殊性。但历史毕竟是前接后续，无法完全割裂的。且不说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的源头；民国出版业积累下来的出版生产力，是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出版活动开展的重要人力物力基础；就是民国时期市场主导的经营运作方式，亦可成为现代出版企业可资取法的重要历史资源。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使民国出版史的研究多了一层学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由于出版工作具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属性，我们在研究民国出版史时，一方面取行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民国出版业如何在一定的经济体制和运作机制下，发展成为当时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当时的出版产业如何布局，出版管理如何进行，出版法律如何制订与实施等；另一方面取出版文化史的视域，考察民

国时期出版活动与当时的政治变革、学术思潮、社会文化之间如何互动，时代如何影响着出版文化走向，出版又如何适应和推动时代文化的发展等。另外，各种学术文化团体如何借助书刊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和扩大影响，各种政治力量如何利用出版进行政治宣传，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地利用出版作为革命斗争的工具，亦是那一时期重要的出版文化现象，需要认真对待。因此，本书所展开的民国出版史叙述，在撰写原则上，强调行业经济史和出版文化史并重，宏观描述和个案分析结合，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物在商业利益和文化价值之间，如何寻求平衡点，给予了特别关注。

本书在章节安排上，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基于历史性的概述，以时间为主轴，梳理民国出版发展的历史脉络，叙说中国出版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这个历程接踵晚清以降出版的近代化步伐，又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步，是国家现代化大过程中的小过程。民国38年的历史，政治风云波谲云诡，文化思潮变动不居，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统治政权的嬗变，其间发生了诸如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事件。民国出版活动以其特有的方式与时代潮流共起伏，反映其变化，接受其影响，参与其进程，并在时代潮流的变革中，显示其本身的阶段性特点。大致说来，民国时期有三次大的历史事件对出版业影响最为显著。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出版业带来的突变——出版物数量激增、出版物内容革新、出版物形式变化、出版机构崛起与调整，都是新文化思潮直接影响下的结果。二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形式上实现了全国统一，国家政治的相对稳定、经济的发展、交通的进步、教育的提高和图书馆事业的增长，都为随后十年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时应势下的出版业，在这一历史机遇下，迎来了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出版高峰，同时也是民国出版史上最为辉煌的黄金年

代——原有的大书局，规模进一步扩大；新设的中小书局，兴跌更替，生命力顽强；书刊出版的数量，更是逐年攀升，至抗战前夕达到历史的最顶峰，其中不少出版物质量上乘，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遏制了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战争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出版业由盛而衰。本书上编，即以这三个重要历史事件为分水岭，将民国出版史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各列一章，构成本书上编一至四章的内容。下编是专题性的叙述，以内容为主轴，分别探讨了民国出版史的各重要专题：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出版经营活动；重要的编辑出版家的贡献与特点；出版与社会文化；教科书出版；丛书、工具书、学术著作与古籍出版；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七个专题各为一章，构成下编第五到十一章的内容。第十二章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既探讨绍往历史，亦昭示前行先机，特作为本书最后一章。

在本书的章节结构和内容安排上还需要作以下三点说明：第一，本书上编各章的内容中，因为分别阑入了一些重要出版机构的介绍，而这些书局书店的存世时间，又多数在十年以上，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更可追溯到19世纪末的晚清，为了保持这些出版机构历史面貌完整不割裂，叙述时的贯通始末就显得必要，如此下来，就无法按照各章节划定的时间顺序对号入座。大致上，根据各出版机构的诞生时间，将它们分别划拨到各历史时段的章节中，民国以前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放在了第一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则放入了第十二章。第二，民国时期出版机构在称呼上不尽统一，名之为书局、书店、出版社、印书馆、图书馆等各种情况的都有，本书行文中往往以“书局”或“书店”笼统地概称这些机构，这是需要向读者诸君特别交待的。第三，本卷历史所言指的出版，概念较为宽泛，同时包括了图书、期刊和报纸的出版，但主要侧重于图书出版，兼及期刊出版，报纸出版涉及不多，只在第三章第三节中对《申报》、《大公报》等少数几个影响大的报纸作了基本介绍，这也是为了与民国新闻史区别开来。

【1】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334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2】梁元生：《序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范军：《出版文化散论》，40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民国时期长期实行的出版登记制度决定了出版业进入的低门槛，也形成了出版主体的多元化和出版机构的复杂化，有人在统计基础上作过毛估，民国时期书刊出版者数量多达万家^{【1】}，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加上时局、思潮等因素施与出版业的种种影响，构筑了民国出版活动的繁冗复杂，这使我们今天勾勒那一时期的出版面貌很不容易。民国历史虽然距今未远，但由于政权的易代鼎革和体制的新老交替，使得许多出版史料未有保存，除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少数几个出版机构延续到新历史时期外，多数书局书店不复续命，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我们研究民国出版史的难度。好在这些年近现代出版史的研究渐成热点，继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省组织纂修地方出版志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发起征集中国共产党革命出版史料，开启了包括民国时期在内的近现代出版史研究之端绪后，世纪之交以来的民国出版史研究渐入佳境。一些个案研究相当深入，如对老牌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史料的汇纂、文章的刊发、专著的出版，多管齐下，有学者甚至认为形成了“一个以‘商务’为中心的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即‘商务学’的出现”^{【2】}。研究者也不再满足于史料的整理与罗列，而自觉地将研究立足于文化层面，从“大文化的视野来考察出版的新路径”^{【3】}。世纪之交以来出版的许多出版史著作题带“文化”二字，如王余光、吴永贵、阮阳著的《中国新图书出版业的文化贡献》（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建辉著的《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常紫钟、林理明主编的《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汪家熔著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范军著的《出版文化散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李家驹著的《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商务印书馆，2004年）等，很能反映出这样一种可喜的学术倾向。另外，从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切入出版史研究，是近几年民国出版史研究中的又一个重要取向。一些与出版关联密切的学科如现

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陈思和、陈平原、杨扬、邹振环、柳珊、孙晶、刘纳、路英勇等人，因关注文学活动与文学生产的关系，而把研究视野拓展到出版史领域，从而使出版史的研究获致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本卷民国出版史的写作，充分吸收了时贤们的研究成果。

本书得以撰写完成，同样得益于前人和今人所做的重要史料积累工作。早在民国时期，一些出版人就比较注意对当时出版情况的总结，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编辑所所长舒新城都曾刊发过相关的文章，他们提供的出版统计数字，本书中多次引用。当时一些书店编的图书销售目录，虽然目的是为了营业推广，但对我们了解那一时期的出版概况，同样有所助益。《申报》上的书刊广告连天接日，在见证了当时书业界浓厚的图书宣传意识的同时，我们也同样视之为研究当时书业发展状况的重要历史线索资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民国出版的各种图书十万种以上，虽然搜罗范围局限于少数几个大图书馆，称不上品种完全，但基本上反映了那一时期图书出版的大略，是本书撰写者认识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情况的重要资料基础。《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23—1949）》、《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等工具书，亦具有与《民国时期总书目》类似的资料功能，值得重视。20世纪50年代张静庐独立辑录的7编8册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本世纪以来出版的由宋原放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出版史料》，以及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诸人合编的10卷本《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编》，这些煌煌大册，都很好地发挥了民国出版史史料集成功能，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极大便利。叶再生著述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以史料丰富见长，本书时有征引。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出版的30余期《出版史料》，刊发了许多曾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书刊、出版单位、著名人物等史料，素为海内外文化学术界所重视。本世纪初北京

版《出版史料》赓续刊印，已出版了20余期。这两份出版史专业刊物，是本书撰写者案头上的常备读物，时作研究上的参考。

这部40余万字的著作，不仅吸纳了海内外学者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也在较多历史问题上运用了新的史料，提出了我们的一些研究心得。但由于专门对民国出版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著述，本卷尚属首例，在无前例可援的情况下，体例结构和方法路径定然存在许多可供商榷和改进的地方。虽然我们作了认真努力，但格于学识水平的有限，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时可能存在理解上的错误，提出的一些新观点也不见得经受住仔细推敲，史料开掘不深入，数据统计不全面，理论分析不充分，都是本书撰写者需要加强的地方，这里特别指出来，提请读者和方家指正。

上 编

第一章 民国出版业的形成

(1912—1919)

第一节 晚清出版业的影响

民国时期出版业是建筑在晚清出版业的基础之上的。作为民国出版业源头活水的晚清出版业，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中，经历了从传统出版向新式出版的嬗变和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官府、改良派、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外国人都积极参与其中，从各个不同方面推动了晚清出版业的发展，并将这一影响顺理成章地延伸到随后的民国时期。

一、传统出版业的延续和衰落

以木版刻印为出版技术特征，以线装竖排为装订排版形式，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出版内容的中国传统出版业，自唐代以降，千余年连绵不绝，对繁荣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促进世界文明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就传统出版业自身的历史进程而言，我国出版业虽然出现较早，但发展却相当缓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一贯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学统观念，未能给传统出版业提供变革的需求和动力。若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老中国在西方列强武力的冲击之下，被迫开始近代化之旅，传统的雕版印刷也许还会像往朝往代一样，波澜不惊地缓步前行。然而，历

史是不能假设的。1842年8月清政府与侵略者签订的城下之盟，决定了中国社会再也不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向继续发展。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给予中国出版业的，不仅是先进的现代出版技术，同时还有全新的出版传播观念。正是在这双重因素的夹击之下，中国古老的传统出版逐渐告别了它昔日曾有的辉煌，走向了它黄昏的末路。

正如雕版印刷取代手工抄写，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时间一样，从西方引进的以铅活字排版为主要技术特征的现代出版业，替换中国古老的以雕版刻印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传统出版业，也同样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整个晚清时代，乃至民国时期，我们都不难在出版业的产业构成中，找到传统出版的因子。我国古代刻书传统中早已形成的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在近代刻书活动中依然一息尚存，不绝如缕。

官刻方面，以官书局为代表的官方刻书，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甚至一度兴盛，时间长达二三十年之久。自1864年前后曾国藩首创金陵书局后，扬州的淮南官书局、苏州的江苏官书局、杭州的浙江官书局、武昌的崇文官书局、长沙的思贤官书局、福州的福州官书局、广州的广雅官书局、成都的存古官书局、昆明的云南官书局、北京的直隶官书局、济南的山东皇华官书局、太原的山西官书局、西安的陕西官书局等接踵而起，他们利用国家和各地政府的力量，大量刊刻反映传统学术文化内容的典籍，数量之多，人称“群籍之要未刻者甚少”^[1]，同时这些“局刻本”，因多为学者名家从事校勘而质量精良，因“平其值而售”价格低廉而流布广远。清末这种官方发动并出资的全国范围的官书局刻书，至于其目的如何且存而不论，但就其保存典籍、传播传统文化方面来说，则无疑具有不可小视的出版意义。

晚清一时兴起的官书局刻书，是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冲击的清政府重振儒家道统、恢复清廷威信的政治需要，也体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中体西用”言论主张在出版上所

【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七，*《经籍考》*十七。